

从“身体流入”到“数字在场”：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范式重构

曹信邦，张鑫龙

摘要：流动人口高水平的社会融入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范式正在经历从“身体流入”到“数字在场”的深刻变革。其中，“身体流入”的被动适应范式囿于物理迁移与制度壁垒，融入过程往往陷入身份认同悬置、社会关系封闭与公共权利排斥的结构性困境。与之相对，“数字在场”的主动建构范式则通过数字身份认同、社交场景重构与数字权利接入三大机制，使流动人口得以逐渐消解地理与制度阻隔，在“流动空间”中实现多维度的社会融入。未来，应在制度、社会与文化层面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数字治理体系，助力流动人口在数字时代实现更全面的社会融入。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6)01-0157-11

一、引言

人口流动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其不仅是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转型的结果，更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构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中国流动人口数量高达3.76亿，比2010年增加1.5亿，占人口总数的26.6%。^①流动人口规模与占比的持续攀升，正深刻改变着中国的人口结构与制度运行逻辑。然而，至2023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6.16%）与同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8.3%）近18个百分点的差距，表明仍有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虽身处城市，却尚未在制度层面真正“扎根”城市。^②具体而言，流动人口因其特有的流动属性而在多个维度显现出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复杂性，致使流动人口在就业机遇、收入水平、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与本地居民存在较大差距^③，进而难以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处于“非城非乡，亦工亦农”的悬置状态^④。这不仅关乎个体福祉，更直接制约着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实现。^⑤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适配性政策工具提升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机理与路径优化研究”（项目号：24BGL256）、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江苏流动人口生育影响研究”（项目号：24ZHA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曹信邦，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研究。
张鑫龙，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保障研究。

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七号）——城乡人口和流动人口情况》，《中国统计》2021年第5期。

② 侯晓丽、徐文静、贾若祥等：《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研究》，《经济地理》2024年第8期。

③ 刘丰睿、陈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动态演进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④ 刘金凤、刘瑞明、石阳：《从“半城市化”到“城市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教育推动机制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9期。

⑤ 田鹏：《超越城乡的新型城镇化——理论框架、多重逻辑与实现路径》，《人口与经济》2023年第4期。

与此同时，作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构成，数字化转型及其衍生出的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已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不同于发达国家“先工业化、后数字化”的转型路径，中国面对的是工业化与数字化并行的双重转型。这意味着国家社会结构与生产方式在经历冲击的同时，各项社会制度也正在面临适用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等方面的系统性挑战。^①流动人口作为更为复杂的人口群体，以“数据”“技术”和“网络信息”变革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必然对其全方位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促进重点群体稳定就业”，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予以数字化转型、社会流动与制度公平的高度重视^③，这也为在数字时代推进社会包容与公平指明了方向。而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意愿、过程与结果则清晰反映了个体在流动行为的全生命周期中能否享受公平、公正的社会待遇。^④

学界之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多建立在以“身体流入”为前提的地理空间迁移的视角，锚定经济融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与身份认同等维度，聚焦于流动行为发生后的在地化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基于亲缘和地缘的社会网络构建以及户籍制度所造就的权利差异等相关问题。^⑤然而，这一经典范式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正如卡斯特（Castells）在网络社会理论中所指出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塑造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其核心特征表现为个体社会权利与认同的场域正在从“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转向“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⑥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这种转变尤为明显。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其所接触的数字化生活与实践已然跨越了这两个空间，使得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正经历一场从“身体流入”到“数字在场”的深刻变革。这反映出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一次技术飞跃，更是国家治理体系所要面临的重大变革。^⑦因此，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并阐释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范式转变？为回应这一问题，本文提出“数字在场”的理论概念，旨在论证：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不再仅依赖于物理身体在场与制度松绑的“被动适应”，而是能够以数字身份认同、社交场景重构与数字权利接入等方式，转向依托数字赋能与主体性发挥的“主动建构”，实现一种跨越地理阻隔却又促进融入实际社会的模式。这并非意味着物理迁移不再重要，而是强调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得到了有效地拓展与深化。这为在数字时代破解流动人口融入难题、构建包容性社会开辟了新的理论视野。

二、数字化转型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范式转变的理论逻辑

（一）社会融入理论的演进

社会融入一词最早出现于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对社会分工论的阐述中。涂尔干由社会凝聚机制的变化推演出社会融入概念，认为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和集体意识是影响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与否的关键所在，其研究视角侧重于整体性规范整合。^⑧而社会融入真正成为被广泛应用的分析范式则兴起于20世纪初的芝加哥学派。^⑨在这一阶段，很多学者将社会融入与社会融合交互使用，

① 陈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数字化转型与社会保障制度适应性改革》，《社会保障评论》2025年第4期。

② 王文：《数字经济时代下工业智能化促进了高质量就业吗》，《经济学家》2020年第4期。

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

④ 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

⑤ 杨菊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人口与经济》2010年第2期。

⑥ Castells, M. (2011).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406.

⑦ 曲锋、白维军：《我国社会保障数字化治理的难点及其突破》，《行政论坛》2023年第2期。

⑧ Durkheim, É. (1922).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Paris: F. Alcan, 141.

⑨ 孙涛、赵岩、翟磊：《社会融入视角下的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基于三亚的实证调查》，《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4期。

在当时的研究中两者内涵并无明显差异。帕克(R.E.Park)将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合分为四个阶段:相遇(contact)、竞争(competition)、适应(accommodation)和融合(assimilation),并视此为渐进且不可逆的社会过程,同时提出“边缘人”“陌生人”和“社会距离”等概念。^①随后,Warner(1945)、Glazer(1970)、Gans(1979)和Portes(1993)先后开创性地提出直线型融合论^②、多元文化论^③、曲线型融合论^④和区隔型融合论^⑤。其中,曲线型融合论是对直线型融合论的批判,强调移民未必能够在新社会环境中实现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善;而区隔型融合论则是对前三种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移民群体的社会适应有多种方式,受人力资本、社会关系等因素的影响,移民可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也可能被迫融入下层社会。^⑥有关社会融合的解读愈发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对“移民社会融入的过程是复杂、多样且多变的”这一观点基本持认同态度。与西方学界聚焦于国际移民不同,中国社会融入研究的对象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主要聚焦于流动人口、农村人口和少数民族三类群体,且这些身份时常交织叠加。国内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层次及指标体系的建构并未形成统一观点,但经济、行为、文化、身份等维度通常受到学者重视。^⑦已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双向甚至多向的互动过程,也正因如此,研究该类问题的视角不能局限于流动人口的自身调适,更需要群体态度、社会制度和公共服务的开放性变革。^⑧

(二) 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范式转变的理论阐释

20世纪末,数字化转型在全球范围掀起继工业革命后的又一时代浪潮。在此时期,卡斯特遵循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出发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意识、城市政治和城市结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进而形成网络社会理论体系。^⑨网络社会理论认为当代社会正在经历信息技术革命,而根植于信息技术的网络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并且必然引起社会形态的改变。这一概念为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范式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当今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自动化等技术深刻改变了社会结构,个体社会权利与认同的核心场域正从基于地理的“地方空间”转向基于流动的“流动空间”。在这一视角下,流动人口以“身体流入”为特征的社会融入过度依赖物理在场和地域性制度安排,而数字化转型则使流动人口通过信息技术实现了“数字在场”,从而重塑其融入范式。

1. 网络社会形成新的社会认同

工业时代的社会机制在网络社会中逐步失去其功能与意义。因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网络化与个体化的冲突,社会处于认同感与安全感均匮乏的不稳定状态。^⑩而个体的社会认同通常建立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则尤其依赖流入地的制度接纳与文化适应,不稳定的社会状态极易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⑪但随着数字技术渗入到个体的全方位生活中,网络连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认同危机,并推动社会机制重建,主要原因在于网络是非中心化的社会组织形式,网络社会的存在不单纯是为了组织活动和分享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其能够承担多种要素的生产与传播。这种去中心化、

① Park, R. E.(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6), 881-893.

② Warner, W. L. & Srole, L.(1945). *The social systems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95.

③ Glazer, N. & Moynihan, D. P. (1970). *Beyond the Melting Pot: The Negroes, Puerto Ricans, Jews, 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3.

④ Gans, H. J.(1979). Symbolic ethnicity: The future of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s in Americ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1), 1-20.

⑤ Portes, A. & Zhou, M. (1993).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30(1), 74-96.

⑥ 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2012年第5期。

⑦ 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⑧ 宋国恺、王起:《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综述》,《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

⑨ Castells, M.(2011).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386.

⑩ 谢俊贵:《当代社会变迁之技术逻辑——卡斯特网络社会理论述评》,《学术界》2002年第4期。

⑪ 杨菊华、张娇娇、吴敏:《此心安处是吾乡——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区域差异研究》,《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4期。

多元化的特性，为流动人口重构社会认同提供了全新的土壤。

对于流动人口而言，网络社会推动了身份认同形式和文化认同形式从单一到多重的转变。在传统融入范式中，流动人口往往面临“非城非乡，亦工亦农”的身份割裂，难以在流入地形成稳定的归属感。而在数字技术媒介作用的影响下，流动人口可以维系多重身份与文化角色，从“被定义的客体”转变为“进行自我建构的主体”，实现从基于“身体”的单一地域身份，向囊括“数字在场”的多元复合身份的根本性转变。流动人口既可以是在现实中为了生存的体力劳动者、公司职员，也能够成为在网络世界中寻求精神需要的内容创作者、参与公共政策讨论的建议提出者抑或依托平台经济的其他衍生身份。由此，流动人口得以进一步摆脱“外来者”的被动标签，主动建构一种作为“线上市民”或“数字劳动者”的新身份，实现从身体标识向数字身份的转型。此外，在既往的社会融入过程中，流动人口通常被动地接收来自流入地单向的文化输出，进而对自身原有的文化属性产生挤出效应，逐步被流入地文化所同化。尽管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有多种形式，但单方面的文化输出仍是阻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①这种文化冲击加剧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难度，且不利于打造稳定、包容的社会文化结构。但在网络社会中，流动人口不再是流入地文化的被动接收者，其可以通过信息技术广泛参与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文化及价值观念产生良性互动，形成流动人口文化属性与流入地文化既融合又区别的文化形式。由此，流入地文化单向输出的不利局面逐步被打破，进而构建起一种双向互动的文化融合渠道，营造更具生机的社会文化氛围，推动流动人口实现文化认同。

2. 网络社会构成新的社会时空

在网络社会中，时空的性质与社会意义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网络的出现将社会要素彼此相连，促进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及时流动，进而使得普遍意义上的空间可区分为“地方空间”和“流动空间”。“流动空间”的出现致使传统社会的地域特征逐渐消弭，时空概念也不再局限于现实的地理空间，人们的社会活动可以不受有限的城市空间所束缚，转而在“流动空间”中得到极大拓展，由此形成新的社会时空。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曾提出“时空延展”（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概念，指出现代社会系统能够跨越传统的时空范围对组织关系进行重构。^②网络社会则将这一观点推向极致，认为“流动空间”正逐步取代“地方空间”，成为社会组织与个体生活的核心场域。

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关系及结构也迎来了相应转变。基于新型社会时空的线上社交打破了社会关系组织性、空间性和规模性的界限，这一现象是引发社会网络发生转变的最主要原因。线上社交更加强调个体性身份的存在，其本质是以个体为中心的网络连接。但在不同个体节点间足够多频次的连接下，线上社交也带来了基于价值认同和共同兴趣的群体聚合。例如，有正式工作的流动人口在工作时间内进行公司事务的劳动，非工作时间则可以通过线上社交平台与外界个体或群体互动，同时也能够通过微信、微博等软件进行亲友聊天、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等。这种聚合超越了地理距离的限制，形成了虚拟但紧密的社会网络。线上社交通过即时通讯、社交媒体平台等工具，构建了新的社会互动时空，其中成员虽可能身处世界各地，却能在共享的信息空间中实现高效协作与情感联结。这种新型社会时空不仅重塑了人际关系模式，还促进了跨地域文化交流、情感支持与社会资本的积累，为流动人口提供了更广阔的社会融入渠道，由此塑造流动人口基于共同价值的集体认同。

3. 网络社会促成数字城市出现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城市的功能、结构与治理方式也发生了深刻转型，逐步发展成为数字城市的形态。数字城市本质上是卡斯特所提出的“信息城市”（information city）的延伸。网络社会理论认为，“信息城市”是信息经济的集聚地，具体表现为通过信息技术建立的以“流动空间”的结构性支配为特征的一种过程，而非形式。而数字城市则是在“信息城市”发展到一

^① 杨菊华、王毅杰等：《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双重户籍墙”情景下何以可为？》，《人口与发展》2014年第3期。

^②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377.

定程度之后，由于新技术已嵌入到整体社会的生产生活且被社会广泛认可所呈现出的较为成熟、稳定的社会形态。

数字城市在网络信息与数据资源可及性较强的情况下，通过智能算法重构了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流动人口也获得了更好的融入机遇。首先，数字城市中流动人口的政务服务、公共服务获取更加便捷、高效。“浙里办”“苏服办”和“豫事通”等各地政府先后推出的线上政务服务平台使得流动人口能够在线办理居住证、社保查询与缴费和子女入学申请等事务，提高在非户籍所在地处理切身事情的效率，办事渠道、流程也更加透明化，削减了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负担，减少办事难现象的出现。这为流动人口提供了相对平等的权利获取通道，消解了流入地的部分制度局限。对流动人口而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能为其带来更多的边际效益，进而大幅度降低制度性融入的门槛。其次，数字城市中的新型就业形态为流动人口提供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遇。随着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和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的兴起，出现了一批新型职业，这些职业的实际劳动过程偏向灵活化和数字化，且不再严格依赖户籍、学历等传统门槛，转而更注重个体的数字技能与平台适应能力，流动人口在这一过程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职业升级与社会融入。同时，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和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为产品供需双方搭建了桥梁，这促进了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沟通与联系，更有利于流动人口成为流入地社会中的一员。

综上所述，本文从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中得到启示，发现信息技术革命正塑造一个以“流动空间”为核心的新社会结构，这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提供了理论透镜。为系统回应“如何理解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范式转变”这一核心问题，本文通过整合社会融入经典研究与网络社会理论体系，构建了“身份—社交—权利”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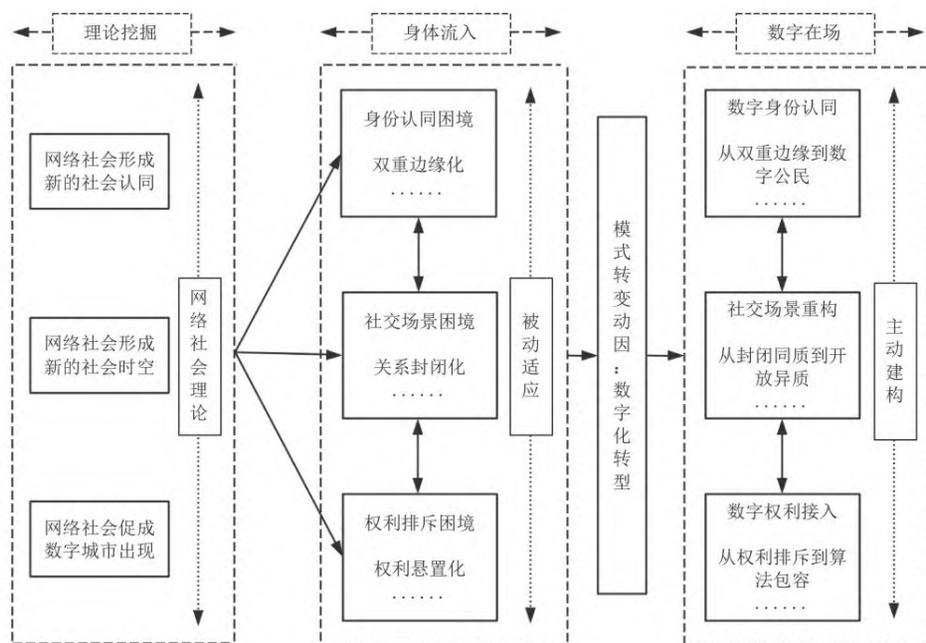


图1 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范式转变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该框架清晰地揭示出，传统“身体流入”范式在身份认同、社交场景与权利获取三个维度上分别陷入“双重边缘化”“关系封闭化”与“权利悬置化”的结构性困境。与之相对，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一种以“数字在场”为核心的新范式正在形成。它并非对前者的简单替代，而是一种深刻的范式革新，其通过数字身份认同、社交场景重构与数字权利接入三大核心机制，分别对传统范式中的困境实现结构性破解，推动流动人口的融入逻辑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建构”。此框架为下文逐层剖析两种范式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清晰的路径。

三、“身体流入”的局限：传统融入范式的结构性困境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本质上是流动人口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行为等多个维度与流入地本地居民相互适应的过程。在当今时代，这一过程备受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各维度的基本理念及运行机制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已发生转变，致使传统融入范式对流动人口实际社会融入过程的解释力已显不足。本节则对“身体流入”社会融入范式结构性困境的具体表现进行剖析。

（一）身份认同困境：文化排斥与身份认同的双重边缘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需要政策性因素予以支持，更需要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的共同推动。^①文化身份的转换是每个流动人口需要重新回答且不断适应调整的问题，而身份认同则关乎其对社会归属感和自我价值的探寻。同时，文化接纳是实现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流动人口的实际社会融入过程中通常表现为先得到文化接纳，而后实现身份认同。^②

流动行为的发生多半出于个体对生存需求、家庭情况的考虑，但这也牺牲了原本稳定的社会归属。从既有研究来看，基于物理迁移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文化接纳与身份认同方面仍存在较大问题。作为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不同文化属性间的碰撞本应使得社会文化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在本地居民主流文化的影响下，流动者的文化外部性难以得到有效纾解，使得自身文化属性在长此以往的碰撞中日渐消弭，逐步形成流入地主流文化向流动者单向输出的局面。具体来说，生活方式、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进一步增加了流动者适应当地城市生活方式的难度，延长了社会融入过程。这一过程并非完全的单向输出，但仍反映出城市文化氛围的包容性较弱。对大部分流动者而言，即便已经在流入地居住多年，仍会认为自己是“游荡于城市的边缘人”^③，流入地始终是为了生计而暂时停留的地方，真正具有内心归属感的是故乡；而对流入地的部分本地居民来说，囿于城乡等级观念、地区资源总量有限等因素，其不太希望流动者能够顺利进入到自己的城市社会生活中。因此，流动带来的疏离感在被动接收文化的影响下会进一步放大，导致大部分流动者处于缺乏文化认同的尴尬状态。

身份认同是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入的关键要素，通常表现为基于城乡分类的由个体身份意识及认知产生的情感归属。^④值得注意的是，流动者常陷入自我与社会认同的双重困境。^⑤一方面，相当比例的流动者认为“自己不属于本地”，是“外地人”或“老家人”^⑥，但同时在家乡亲友的眼中，流动者工作、生活于城市，是所谓的“城里人”。这种双重边缘使流动者在社会融入过程中感到迷茫和无助，进而会对自身的职业成就、婚姻家庭等产生持久影响。^⑦另一方面，城市本地居民与流动者之间缺乏交流与沟通，且其对流动者“外地人”的刻板印象会加剧社会排斥，导致流动者形成“不属于本地”的自我认同。正如帕克对“边缘人”的描述，流动人口是游走于城乡两种文化和社会边缘的群体。当他们进入身份与文化异质性较高的城市后，更易产生认同上的疏离感，从而阻碍其社会融入。^⑧

（二）社交场景困境：亲缘与地缘关系的传统维系机制

出于对陌生环境不确定性与资源稀缺的相应需求，流动者初期更倾向于依靠由亲缘和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的支持。亲缘、地缘网络作为具有情感基础的关系形态，能够在流动初期为流动者提供生活

① 谭任均：《从嵌入到融入：流动人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于对珠江三角洲流动务工人员的田野调查》，《西北民族研究》2024年第3期。

② 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③ 刘志山、王杰：《移民文化流动性特征、影响及对策》，《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④ 杨菊华、王毅杰等：《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双重户籍墙”情景下何以可为？》。

⑤ 谭任均：《从嵌入到融入：流动人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于对珠江三角洲流动务工人员的田野调查》。

⑥ 李天娇、王莹、韩艳丽：《家庭化迁移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基于三类迁移模式社会融入的比较》，《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⑦ 宋月萍、刘志强、唐士茹：《青年流动人口二代的社会融入：内涵、特征、困境及应对》，《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6期。

⑧ Park, R. E. (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6), 881-893.

支持、心理慰藉和互助资源。这种较为单一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流动人口适应新环境的早期阶段具有积极功能，给予流动者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使得流动者进入新环境后可以迅速适应日常生活并降低社会排斥风险，一定程度上防止其完全沦为“城市边缘人”。^①

一方面，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一个持续的再社会化过程。个体在离开户籍地到流入地的社会流动过程中，需要新的社会环境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并适应新的社会规则。然而既有研究表明，流动者于乡土社会中形成的重亲缘、地缘关系的文化惯习并未因生活地点或职业的变动而改变。流动者获得信息的来源、寻求工作和人际交往的方式以及语言习惯大多仍依赖于既有的社会网络，呈现出封闭化、同质化和功能单一化等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广度与深度。深层次原因在于，基于亲缘、地缘的相互支持和相互认同会使得流动人口逐渐成为偏离城市主流群体的亚文化群体，引致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社会交往方面的隔离。^② 流动人口的社交圈层长期以同乡为主，是一种“泛家庭化”社会交往方式的体现，其本质上是传统乡土观念在现代城市的延伸。^③ 这类社会关系有着极强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导致流动者的社交往往局限于熟人圈层中，难以与本地居民建立起跨群体的互动联系。此外，这种模式的社会关系功能通常偏重生存支持与经济互助，缺乏情感认同和文化交流的功能。长此以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确实可以正常生存，却并不能促进流动人口实际的社会融入。

另一方面，传统社会关系结构与城市社会的陌生人机制之间存在制度性张力。与流动人口依赖于熟人网络的社交逻辑不同，城市社会中的社交有着契约化、制度化的特性。熟人社会中的社交互动基于长期的情感积累，城市社会则以正式制度与社会规则为遵循。这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进程中引起了社会关系的结构性断裂，即流动者获得的资源有限，且流动者在城市社会中难以建立起制度化的社会资本与公共参与能力，使得流动者长期处于社会支持匮乏的状态。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空间依附性也加剧了社交场景的局限。由于流动人口社会关系网络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其社交活动所依托的方式、场所也往往与城市核心地域存在区隔。再加之公共交流平台的缺乏，流动人口在物理空间上的隔离直接影响了其社会网络的开放度与信息流通效率，导致社会交往机会不均等，进而造成社会网络的进一步断裂，削弱了流动人口获取社会资源及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

（三）权利排斥困境：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获取的隐性壁垒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根本目标，不仅在于个体在文化和社会关系层面的适应，更在于其能否在制度层面实现平等的权利获取。根据博格（Bogue）的推拉理论，当流入地“拉力”大于流出地“推力”时，个体才会确定流动行为^④，即流入地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预期收入或更好的教育资源等因素是流动者选择流动的主要原因。然而，长期以来，受制于户籍制度及其基础之上各种社会制度的局限，流动人口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权利等方面普遍面临制度性排斥的困境。^⑤

中国的户籍制度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之上，其核心目的在于更好地进行人口管理与城市资源配置。但在城镇化与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这一制度设计引发了一系列权利公平风险。地方以户籍制度为标准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分割状态，即便流动者已在流入地生活多年，仍难以在政治参与、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享受与本地居民完全同等的权利。这种社会资源与公共服务获取的不均等化加剧了流动人口的社会排斥感。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作为社会融入的重要支撑领域，其资源配置长期与户籍身份挂钩。以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为例，虽然“就近入学”政策持续推进，但由于有限的学位资源与管理制度的差异，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办理入学仍普遍遭遇

① 王章华、颜俊：《城市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问题分析》，《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② 高春风：《社会工作介入流动人口城市社区融入的思考》，《社会工作（下半月）》2010年第5期。

③ 张展新等：《城市社区中的流动人口：北京等6城市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10页。

④ Bogue, D.J.(1969). *Principles of demograph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753-755.

⑤ 郑信哲：《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与融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资格限制、择校费用高昂等问题。医疗保障方面，现有技术可以实现跨地区医保结算，但在实际执行层面依然存在地区差异与制度壁垒，流动者异地就医面临报销程序繁杂、报销比例较低等问题。住房政策方面，申请城市公共租赁住房与经济适用房普遍要求本地户籍，这导致流动者多依靠市场租房解决居住问题，加之租房成本较高，流动者通常选择偏离城市核心生活圈的出租房，居住环境相对不稳定。

另一方面，在数字化转型尚未全面深入社会生产生活之前，线下获取公共服务的模式放大了制度障碍的现实影响。公共服务供给依赖于纸质证明和行政审批流程，流动者在流入地办理事务时易陷入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在缺乏跨区域数据共享机制的现实情境下，流动人口常被排除在部分公共服务之外。长期的制度性排斥深化了流动者“外地人”的自我认知，自信心缺失进一步削减了流动者的社会融入水平。^①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传统“身体流入”范式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不仅受制于空间距离，更受制度障碍所影响。近年来，政府对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策的改革调整虽有不同程度进展，但均未能取得根本性突破。

四、“数字在场”的建构与实现：数字时代的新融入范式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经济生产方式，也在深层次上重塑了社会整体结构与个体间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②这预示着在数字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今社会，个体的数字化生存将会成为必然。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其社会融入正在逐步突破“身体流入”的结构性困境，转向一种以“数字在场”为特征的新范式。“数字在场”的核心，在于流动人口能够利用数字技术，主动地完成身份重构、社交拓展与权利获取。这并非对“身体流入”的完全替代，而是社会结构逻辑与制度整合方式新的呈现。数字在场的建构，意味着个体社会连接的方式由线下向线上拓展，社会资源的分配机制由物理供给转向数据驱动。由此，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进入了以数字化连接为基础、以算法性包容为核心的新时代。

（一）身份的数字化转型：数字身份与文化认同的重构与转变

身份是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与标识。传统“身体流入”范式下，流动人口的身份深陷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割裂中，长期处于“非城非乡”与“双重边缘”的悬置状态，展现出单一、固化的身份属性。而数字社会以其特有的连接性、多元性与可塑性延展了个体身份的构建空间，对个人身份的象征与识别从实体空间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空间，为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带来了革命性的重构机遇。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和自动化等数字技术给予流动者以更灵活、自由的社会关系连接方式，身份不再完全由户籍、职业或地域决定，个体的生产生活得以有更大的空间，进而衍生出数字身份。^③数字身份是信息化社会的直接产物，指个体身份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将行动轨迹转换为数字，并以人的行为为基础将个人信息进行多元转化的过程，其本质上是对既有身份的补充，与既有身份作为个人信息在数字空间中的映射与集合并立存在。^④

一方面，数字身份的生成以个体的行为数据、社会网络与数字活动为基础。这表明流动者在线上空间进行注册、认证、支付和交流等行为能够产生多重身份片段，而这些数字身份片段共同构成了超越身体依附的“数字自我”。在这一过程中，流动者的身份逐步从“外地人”向“数字公民”转化。具体来说，在现实空间中的流动者可能被简单标识为“进城务工者”或“外来居民”，但在数字社会中，由于技术要素同样广泛应用于流动者的生产生活，使其社会时空得到延展，流动者同时也可以成为各种技术

① 闫伯汉：《制度排斥、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社会融入——基于广东省东莞市的分析》，《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② 《习近平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0日。

③ 李韶驰、郑佳斯：《政府数字化转型中的个人数字身份运用：机理阐释及优化路径》，《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9期。

④ 黄铭心：《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视域下数字身份的构建》，《思想理论教育》2024年第4期。

论坛中的“答主”、线上建言献策的“政治参与者”和兼职工作的“电商店长”等。根据网络社会理论,认同的建构更多依赖于个体的主动参与和互动反馈。因此,这种数字身份叠加过程中所得到的数字反馈则能够显著增强其自我效能与价值认同,使得流动者的个人价值与社会认同不再被单一、固化的既有身份所垄断。通过在不同数字场景的有效参与,为流动者提供更丰富、多元的社会实践,极大纾解了因既有身份单一、固化而产生的认同焦虑,进而一定程度上实现个体的社会认可与自我认同,从社会参与和心理认同方面促进流动者的融入水平。此外,伴随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平台经济及其基础上产生的多种新兴就业模式应运而生。^①平台经济兼具协同性、共享性、普惠性等特质,理论上有着促进人民群众共享幸福美好生活的天然功能。^②在此背景下,流动者有更多的就业选择,其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受益于平台经济的优势也得到发展。而资本的累积能够促进个体的身份认同^③,使流动人口更易融入社会^④。

另一方面,传统范式下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通常表现为被动地接收流入地文化输出,并逐步被同化的过程,其结果会导致流动者文化归属及自我认同的迷茫。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时空延展为文化双向传播渠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数字平台的出现大幅度降低了社会参与和内容创造的门槛,流动人口得以实现从文化“消费者”向文化“生产者”的转变。例如,流动者能够利用线上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自主叙事,记录并分享其日常工作与生活体验等内容。在此过程中,流动者不再是城市文化的“旁观者”,而是成为“参与者”,其文化适应方式从流入地文化的单向“涵化”转为了多元文化的双向“互化”。城市文化内涵因而日益丰富,这也为流入地包容性治理体系的建设减少了文化观念的阻碍。由此,流动者作为城市“共建者”而非“外来客”的成员感与归属感便油然而生。这种“线上市民”的身份,虽并不完全等同于本地户籍的市民身份,但却是一种基于数字实践、情感连接的心理认同与身份认同,为最终实现深层次的社会融入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社交的场景重构: 数字社交的场景跨越与关系拓展

数字化转型引起新一轮的媒介革命,打破了传统社交传播格局所面临的时空区域、地位阶层等物理性和社会性阻隔,并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进行深刻重塑,进而引发社交格局发生全球性、系统性变革。^⑤

社交是生成社会支持的重要方式。从支持主体来看,社会支持可划分为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两类。正式社会支持通常指源于正式制度安排的支持供给,非正式社会支持则是指基于亲缘与地缘等社会网络所形成的社会支持。非正式社会支持由于其获取渠道更为畅通的特性,能够给予个体直接、快速的物质和精神支持。相应地,受制于户籍制度引发的正式社会支持获取的群体异质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高度依赖于亲缘与地缘网络,这在流动初期能为流动者提供基本的生存与生活支持。但长此以往,这种单一型社会网络趋于封闭化与同质化的局限便日益显现。而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这一社会关系的形成逻辑得到重构。一方面,数字信息技术降低了交往成本,既加强了流动人口既有社会网络的连接强度,有利于维持与老乡、亲友和同学的“强社会关系”^⑥;另一方面,也为流动人口搭建起与本地居民沟通和交流的桥梁,进一步扩展社会网络规模,在既有社会网络基础上强化了“弱社会关系”^⑦。总体而言,在

① Mulcahy, D.(2016). *The gig economy: the complete guide to getting better work, taking more time off, and financing the life you want*. New York: Amacom, 50.

② 邹月晴、陈媛媛、宋扬:《家乡数字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回流——基于互联网平台发展的视角》,《经济学报》2023年第1期。

③ 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2012年第5期。

④ 彭灵灵、林蕾:《社会组织、社会资本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一项经验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⑤ 《学术前沿》编者:《数字时代社交新格局》,《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19期。

⑥ Nowland, R. & Necka, E. A. & Cacioppo, J. T. (2018). Loneliness and social internet use: pathways to reconnection in a digital world?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1), 70-87.

⑦ 王思、张祎盼:《数字经济如何提升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基于社会融合程度的视角》,《南方经济》2025年第5期。

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社会网络突破了基于地理空间的亲缘、地缘关系的束缚，形成了跨地域、跨群体的社会连接方式。流动人口在“流动空间”中重新建立并逐步拓宽社会网络，完善个体“弱社会关系”的空缺，从而拓展了社会资本与情感支持体系。

流动人口的社交活动场景从线下转为线上、线下并行，生活叙事也从地方性延伸为网络化。在这一过程中，流动者可以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和社交媒体平台等方式维系并拓展社会关系。这种基于文化认同与数字链接的社会网络，为流动者提供了表达、倾诉与互助的空间，也降低了流动者参与城市公共生活与跨群体交往的门槛，促进其社会网络从虚拟认同向现实融入落地，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得到一定的心理慰藉与身份归属。此外，数字时代的社交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再积累。流动人口能够利用线上社交所拓展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更多的信息与社会资源，为深层次的社会融入嵌入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例如，社会关系较为薄弱的流动人口可以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就业率，使其摆脱生存型就业，转而在相对待遇更好的岗位就业，由此提高收入水平与融入程度。^①

（三）权利与服务的数字接入：算法包容性下的数字政务与公共服务

伴随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中国以户籍制度为基准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所显现出的局限性有所削弱。根本原因在于，数字技术的出现及在城市治理中的广泛运用促成了城市空间的新形态。这种新形态指以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为手段，在城市整体时空范畴内所形成的虚拟空间。它锚定效率导向，为人类活动提供了新的载体，将生产生活场所从自然空间拓展向数字空间。^②从而推动公共服务由“户籍本位”向“人口本位”转变，实现权利的“数字接入”。

数字政务与智能算法的深度普及，正在改变资源及信息的传播方式，为流动人口提供一种“数字化的制度通道”。各地推出的如“浙里办”“苏服办”和“豫事通”等政务平台，进一步推动了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共享，极大提升了公共服务可及性，使流动人口更易接触到各项事务的办理渠道，并规范、统一了办事标准与流程。当流动者需要办理电子居住证、社保缴纳和子女异地入学申请等切身事务时，通过数字政务平台即可“高效办成一件事”，无需承担高昂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数字政务的本质在于通过算法整合社会公共资源，塑造出权利的“数字通达性”。在此过程中，流动人口不再被动地游离于地方制度之外，而是主动建构一种适应于权利获取的数字身份，顺利进入国家治理网络之中。从办事效果来看，数字政务更便民、更高效；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数字政务消解了部分由于流动所面临的制度壁垒，给予流动人口以相对平等的权利获取通道。数字政务平台去地域化、透明化的特征有效提升了制度包容性，削弱了制度性壁垒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负面影响。

同时，大数据与算法推荐的有机结合促进了公共资源的精准投放与机会公平。数字平台能够基于个体的行为方式和地理位置等数据，智能推送与个体相匹配的招聘信息、保障政策与技能培训服务等。政策得以“由上至下”地触及目标群体，一定程度上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机会遗失现象，为流动人口的向上流动提供技术支撑。此外，数字技术催生出的新就业形态与数字普惠金融，使社会经济权利得到延展。平台经济与零工经济创造了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在线客服等众多类型的职业，这些岗位更看重个体的数字技能与履约效力，为流动人口提供了绕过传统歧视性招聘的就业通道；同样的，移动支付、数字保险等服务使流动者能够获得更方便的金融支持和补充保障，弥补了传统社会保障网络覆盖不足的短板。

五、结 语

本文围绕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范式转变问题，系统阐释了从“身体流入”到“数字在场”的理论演进，并基于网络社会理论，构建“身份—社交—权利”的整合性分析框架揭示数字化转型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机制的结构性重塑。在此过程中，“数字在场”并非对“身体流入”的简单否定，

① 戚聿东、褚席：《数字生活的就业效应：内在机制与微观证据》，《财贸经济》2021年第4期。

② 秦锋砾：《数字化时代城市权利的空间逻辑与建构路径》，《湖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而是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范式的拓展与深化。这决定了流动人口不再仅是被动适应的政策客体，而是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参与者、共建者和受益者。这一范式转型，既体现出数字化转型对社会结构的重塑力量，也直观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在数字化进程中的制度调适与包容性转向。

然而，数字化转型对社会结构的重组，决定其必须嵌入于公平、公正、普惠的社会治理框架中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反之，数字化的生产生活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分层机制，使流动人口在数字时空中“在场”，却在现实生活中“缺席”。因此，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从三个维度持续深化“数字在场”的现实意义。

第一，应在制度层面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数字治理体系。政府需要进一步优化跨区域数据共享机制，确保流动人口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与本地居民同等的权利，推动公共服务成为促进社会公平的桥梁。第二，应在社会层面强化个体的数字素养和社会参与。数字鸿沟现象必然存在，因此更需促进流动人口的数字技能培训，使其能够主动参与到平台经济、数字治理与公共事务之中。同时，应鼓励社会组织、社区与企业积极参与数字建设，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多元治理格局。第三，应在文化层面培育包容性的数字公民意识。数字社会的融合不仅是制度的整合，更是文化的共生。应倡导多元文化的互认机制，让流动人口的数字表达成为社会文化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数字时代的“共享归属”。

From “Physical Inflow” to “Digital Presence”: A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Integration for the Migrant Population

CAO Xin-bang & ZHANG Xin-long

(School of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High-level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s an intrinsic requirement of people-centered new urbanization. The paradigm shift in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du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change from “physical presence” to “digital presence”. Under the passive adaptation paradigm of “physical inflow”, constrained by physical mi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ten falls into structural dilemmas characterized by suspended identity recognition, closed social relations, and exclusion from public rights. By contrast, the active construction paradigm of “digital presence” enables migrants, through three key mechanisms, namely digital identity form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interaction scenarios, and access to digital rights, to gradually overcome geographical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to achieve multidimensional social integration within “spaces of mobil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more inclusive system of digital governance at the institu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levels, so as to facilitate more comprehensiv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migrant popul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Migrant Popul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赵蔚平、张莺译]